

巢

湖

卷

下

安徽 文史资料 全书

Anhui Wenshi Ziliao Quanshu

安徽人民出版社

Anhui Wenshi Ziliao Quanshu

安徽文史资料全书

巢湖卷下

Chaohu Juan



安徽人民出版社

无为根据地的教师节

蒋克祚

抗日时期根据地的教师节为每年的6月6日，各地亦十分重视这一节日的活动。1944年5月30日，无为县政府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本年教师节的庆祝问题，还成立了庆祝无为县教师节筹备会。在战事频繁、财力尚不充裕的抗日战争环境中，还这么重视教师节，确实是难能可贵的。6月6日，无为县教师节庆祝大会在恍城区上庄院子召开，行署主任吕惠生和县委、县政府负责人均出席，吕惠生还作了《关于发展文化教育》的长篇讲话，他在论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及本地区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具体措施后，要求各级行政人员要重视教育，要求教师把自己的工作与中国当前的抗日救国、建设事业联系起来。平时，吕惠生亦十分关注教育工作，在他抗日战争最后3年的日记中，就有多处关于到某学校视察讲话，中小学学校数、教师数、塾师数和学生数的记载。

设立在无为的抗大第十分校

陈仁洪

1945年5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新四军第七师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成立了。当时我任该校教育长。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虽然工作几经变化，但在抗大十分校生活、工作留下的深刻印象，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战友们和同志们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每当从这段历史的回顾中把思绪牵回，总是从心里感慨我们党对教育事业的极度关怀和重视，即使在频繁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也着眼于未来，把教育摆在一个重要位置上，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适应迅速发展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优秀的军政指挥人才。新四军七师抗大十分校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那样的艰苦环境和条件下，它与其他学校一起，共同担负起了这项光荣和责任重大的任务，在新四军七师领导和全体学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七师抗大十分校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以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四军七师抗大十分校的全称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皖江区第十分校，它的前身是新四军七师教导大队。

新四军第七师于1941年5月1日在安徽省无为县东乡白茆洲正式成立，当时，皖南事变的硝烟尚未散尽，国民党正在疯狂地掀起反共高潮，斗争形势异常严峻。

新四军七师刚成立时，全师约有近2000人，主要包括皖南事变前在安徽省长江两岸坚持游击战争的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分，三支队五团原留在江北的一个营，桐（城）东和无为的地方武装，还有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陆续到达江北无为地区约有1000人的新四军指战员，其中大部分是干部，大都编入七师。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

新四军七师成立不久，师领导便着手组建教导大队。目的是为了更快地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培养更多的军政干部。教导大队刚成立时，由袁大鹏任教导大队的大队长，下辖两个中队：一个队是由部队调来的基层干部队，负责培养军事指挥干部；另一个队是接收地方新参加工作、具有初中或高小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负责培养部队的文化教员、青年干事等政工干部。教导大队最初就驻在无为县的大王家村，受师部直接领导。它跟随师部，一面作战，一面坚持教学，渡过了初创时期的最艰苦岁月。

1943年，七师的部队逐渐发展壮大，全师扩大到6000余人，在皖江地区建立了大块根据地，七师的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并在巢无中心区的北、南、西三面建立了3个地委，分别是和含地委、皖南地委和皖西的沿江地委。这时，部队为适应斗争形势的

需要，实行地方化，改编为3个支队。师兼军区，支队兼各军分区，七师代师长谭希林兼皖江军区司令员，师政委曾希圣兼皖江军区政委，下属各支队领导分别兼各军分区的领导。同时，各部队开始实行中央的精兵简政政策，缩小机关，充实基层。抗大华中总分校这时结束，学员分配到各部队，干部和教员都被分配到抗大各个分校。当时七师尚未成立抗大分校，这批教员和干部来到七师后，便被分配到教导大队工作。这时教导大队已由过去的两个队扩大到四个队，一队是营以上干部队，二队是连级干部队，三、四队是班排级干部队。教导大队由于充实了这批骨干，教学、训练越来越走向正规化，组织机构也日益完善，在此基础上开始酝酿创办抗大分校。

1943年春夏之季，日军接连对我皖江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残酷扫荡，妄图消灭新四军七师的首脑机关和在巢无地区的主力。新四军在巢南山区大王家、银屏山、石涧埠等地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粉碎了日军的几次扫荡。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也不断与新四军发生摩擦，制造事端，并向我巢无中心区两次进犯。新四军七师指战员同仇敌忾，对无端挑起事端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猛烈反击，取得了反顽自卫斗争的空前胜利。

但是敌人的进攻并没有停止，日军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相互勾结，使抗日战争进入到艰苦的相持阶段，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峻，大规模的扫荡越来越频繁，部队经常处于作战和行军的紧张状态中。根据这种情况，师部作出决定，暂不开办抗大分校，并为减少暴露目标，采取分散办学的方式，以便更好保存干部和教学骨干，继续为部队培训干部。这样，除师部留下1个队以外，由王韬、尚民带领1个队到达含和地区；路坚带领1个队到达沿江支队；王俊、阮吉祥带领1个队到达皖南支队。大队长袁大鹏调往部队担任团长，师部教导大队的建制暂时取消。

1944年秋，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逐步胜利，形势开始有所缓和。七师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干部的培训又摆上了议事日程。师领导决定，以原教导大队留在师部的那1个队为基础，建立师（军区）干部训练班，由杜剑华担任训练班主任。干部培训的对象主要是来自部队的营团职以上干部。由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学员越来越多，所以，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日益安定，师部领导又重新开始考虑成立较为正规的学校，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5年的初春，抗日战争已进入反攻的准备阶段，日军紧缩兵力，在战略上开始退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七师领导抓紧这有利时机，迅速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队伍，全师这时已发展到3万余人。但是干部的人员少、素质低又成了突出的矛盾。为迎接全国反攻的到来，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培养大批优秀的军政干部，师部在4月份研究决定，正式成立抗大十分校，后报经新四军军部批准，在原来教导大队和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皖江区第十分校终于在安徽省无为县的山水涧团山里村正式成立了，对外简称七师抗大十分校。

七师抗大十分校的建立，得到了新四军军部首长及师部领导的亲切关怀，新四军七师代师长谭希林兼任校长，师政委曾希圣兼任学校政委，将我从部队调到十分校担任教育长，还任命杜剑华担任副教育长，阙中一任政治协理员（政治处主任）。

由于有了前段时期教导大队办学的经验，学校各项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虽然当时所处的环境相对稳定了一些，但日寇正在进行垂死挣扎，战斗还是比较频繁，形势还是

十分严峻。为了尽快培养出部队和地方急需的合格干部，七师抗大十分校从一开始便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组织管理系统，为教学和训练的正规化和制度化起了很好的保证作用。

七师抗大十分校当时的组织序列是：在谭希林校长和曾希圣政委的领导下，设有一个校务委员会，这个校务委员会负责研究、决定和处理某些重大问题。校委会由我和阙中一、杜剑华以及党总支书记等组成，我和阙中一分别担任正副书记。有时在研究处理某一业务方面的具体事情时，也吸收军训和总务部门的负责人参加。

校务委员会下设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总务3个股。军训股长是位姓蔡的老同志，教员有楼少文、梁血夫、李培泽、韩旭等。政教股长是郑康，教员有田兰田等四五人。总务股长姓吴，下设管理、会计和卫生所，会计王泽娟，卫生所庞军医。

学校还建立了党总支，总支书记田志春，后来由王继松接任。干事有郑人觉和另一位同志。特派员邵占甫。校部政治指导员杨灏。俱乐部主任庄达。校部技术书记是许平。

这些同志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安排，接到调令后迅速来到十分校报到集中。他们中大多数都曾在抗大总校和华中党校学习或者执教过，又在部队基层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对办好十分校都有一颗强烈的责任心。办学之前，师部领导又都亲自找我们谈了话，更加激发和坚定了大家齐心协力办好学校的热情和信心，同时也使大家明确了贯彻抗大教育方针的正确方向，为保证教学质量，培养更多部队急需的合格干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七师抗大十分校共有5个学员队，其中一、二队是军事队，学员的主要来源是部队的连排长，还吸收了一些优秀老班长；三队是地方武装干部队，学员的来源多是地方游击队的战斗骨干，以及在地方分管军事工作的干部；四队是政工干部队，学员主要来自部队的正副指导员和准备担任政治工作的排长；五队是学生队，学员大都来自上海和其他城市地方上招收的青年学生和部队中的中学生，这个队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培养文化教员、文工团员、书记、文书等人员。另外，还为区党委代培1个地方干部训练班，学员大都是在敌占区暴露了身份的各级地方党政干部。

学员队干部名单如下：

一队（军事队）队长赵刚，政治指导员舒政。

二队（军事队）队长韩文甫，政治指导员单扬。

三队（地方武装干部队）队长张振中，政治指导员张中琪。

四队（政工干部队）队长某某某，政治指导员某某某。

五队（学生队）队长汪伯昆，政治指导员张平。

学校在办学开始，就把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立足于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努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武装每一个学员的头脑，把他们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端正和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学习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学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还学习瓦解敌军、战时群众工作以及怎样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宣传和

动员群众等。学习的教材，主要是参照抗大总校和华中总校的课本和教学大纲，并结合新四军在皖江地区对敌斗争实际而制定的。在学习期间，每个队的学员都要系统地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论述，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各个队还根据自己队的专业制定了各自的教学内容，各有侧重地进行教学。

学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学员们学习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当时处在战争环境，学员们回去后就要奔赴新的战场，亲自带兵打仗，所以学员们对学习军事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我们也从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我军装备情况和战术要求的教学方案。战术训练是以连排的战术动作为重点。单兵训练是以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重点。理论讲解是以游击战、麻雀战、夜战为重点并结合具体战例，深入浅出地形象教学。课程的安排非常紧凑，每天的教学内容都是结合演习和操练在野外进行的。从单兵的技术到连以上的攻防战术训练，都经常反复进行演练。当时正值夏季，天气十分炎热，学员们顶着烈日，在野外摸爬滚打，一丝不苟地进行练习，非常严肃和认真。由于学员大都是来自部队的干部及战斗骨干，有着丰富的实际战斗经验，在学校学习期间又十分刻苦努力，所以他们的成绩提高很快，毕业考试都取得比较优秀的成绩。

七师抗大十分校的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学习和生活的条件也很艰苦。学员们大部分住在团山里村的祠堂里和民房里，也有少数就住在附近的村庄里。教员们没有向上级伸手，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制作出了各种各样教学器材。村旁的场院和祠堂就是课堂。门板一竖就是黑板。学员们一人做一只小凳，双膝一合就是课桌。大家非常珍惜这短暂的学习机会，毫无怨言。

每天清晨，当晨曦刚刚发白，嘹亮的军号划破寂静黎明，学员们伴随响亮整齐的口令开始了操练。紧张的学习生活，使大家始终保持着饱满的精神，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保证了教学任务的顺利进行。每当夜幕降临，村子里便响起了激昂的歌声。学习了一天的学员们，不顾疲劳，还在热烈地讨论，相互交流着学习的体会和经验，教员们也都深入到各队组织大家进行讨论，学校内时时充满民主的气氛和拼搏的精神。

当时，学员们的学习期限，有3个月轮训的，也有学半年的。除五队（学生队）由师部统一分配外，其他各队学习毕业后，学员的分配原则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我们校委会根据这些情况，多次召开教员会议，提出抓紧有限时间、保证教学质量、培养合格干部的口号。教员们自觉地把搞好教学与提高部队战斗力、多打胜仗、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大目标联系起来；早起晚睡，把心都扑到学员们的身上；对所教的课程反复备课，有的讲义几经修改。虽然每一期学员在学校里学习的时间并不太长，可是他们学到的知识都凝聚着教员们的心血，这些知识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我们始终以提高学员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摆在首位，使学员们不仅系统地学到了一些战术动作和军事常识，更使他们具备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树立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强信心和建设新中国的远大理想。在七师抗大十分校学习过的学员有1000多名，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后，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有的同志屡建战功，有的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优秀的指挥员，有的同志在

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他们对在七师抗大十分校学习生活过的那段实践都留有深刻的印象，以至终生难以忘怀。

我与十分校的同志和学员们，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中迎来了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时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实现，从维护全国和平大局出发，决定对国民党作出让步，将新四军从包括皖中、皖南在内的南方8块解放区撤出。9月间，驻皖江地区的新四军七师接到军部命令开始北撤，十分校随同七师师部一并撤退到苏北的淮阴。这年10月间，七师进行了整编，抗大十分校正式改名为七师干部随营学校，具体事务由陆学斌负责。我和阙中一、杜剑华等人以及部分教员被师部任命到部队新的岗位上任职，大家满怀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离开了这所培养和锻炼人的革命熔炉——七师抗大十分校。

创办义务补习学校

李山樵

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处在全面崩溃前夕。和全国形势一样，和县的一些小吸血鬼们，也逐渐地龟缩起来销声匿迹了。学校解散，教室空空，狐鼠跳梁。这时候，家乡（绰庙乡）青年陷于失学境地，相互串走，惶惶终日，前路茫茫。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毅然在湾子李村我的家里，创办义务补习学校。随后，绰庙集、金城庙、石村庙、杨石巷、乌江、香泉等地高初中失学青年30余人，相继聚集我家，由我为他们义务补习语文、英语及数学3门课程。上午教语文及英语，下午教数学。一个星期做一次作文。伙食由学生自己带米，熟菜饭集体吃。我当时编了一支歌，每天早晨和下午课后，和同学们一块唱。歌词是：

太阳出来了，爸妈都欢笑！严冬消逝，瞭望春光好！

太阳出来了，学习要起早！北国风云，涌天滚新潮！

太阳出来了，生活自创造。动手动脑，艰难能除掉！

我在教学间隙，爱和学生谈高尚情操，远大理想，勉励他们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对青年学生，我总是怀着爱的教育心理，努力奉行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

1949年7月，时任乌江区长蒋克礼，要我至绰庙集开办绰镇中学，内附完全小学。小学在绰镇，高初中在坝沿赵村，中小學生有300余人，由我任校长，陈全武任教导主任，夏禹功、禹令闻等10多位教师与我志同道合，皆能热心教育和辅导青年学生，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当年学生有秦圣非、端木礼海、王乾凯、孙绍基、吕成珍、吴有颜、赵从濬、汪廷璋、王荣芝、樊慕凡、邹邦才等。后来，他们在各条建设战线都有着不同建树，作为一个辛苦的园丁，终于见到了汗水浇灌的桃李硕果，亦殊堪自慰。

1950年秋，巢湖专区文教科周醒夫科长示我将绰镇中学的学生带到和县中学。我到和县中学任教导主任，代理校长，执行校务。当时和县县长李志兼任和中校长。李志曾聘我为和县土改委员、人民代表并参加主席团，足见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厚爱与关怀，哪怕是做了点滴贡献，也给予极大的荣誉和鼓励。

每当我回忆这段往事，便感欣慰不已。后来我的学生们还常在给我的信中忆及此事。他们对我敬爱，我也更加对他们寄予了厚望。记得1980年4月，时任和县文化局领导、知名作家秦圣非在给我的信中还这样写道：“您是在我困难中闯进我的生活的。1949年大军渡江前夕，和县仅有的三所中学都已停办。我们这些想读书的孩子，只能在尚不平静的生活中，尝受着失学的苦恼。就在这时，您在和县首创了义务补习学校，后来成为绰镇中学，使一批失学青年得以复学。这种气魄和功勋那时是有口皆碑，而现

在我们当年的同学相聚时，都难以忘怀。”在七期班上十分优异成绩过的那段实践部

1978年，我写了一首《忆江南》的词：

新年好！

往事知多少？

海阔天空纵眼眺，

翻云覆雨我常笑。

几曾识年老！

这首词后被秦圣非看到，他和了一首给我：

春来早！

绿披杨柳梢。

休对故人怀故国，

且看新燕筑新巢，

旧年花更俏！

读到这样发自内心的信和词，使我更加欣慰了。

膏药王陈四一

王德培 张宏基

陈四一膏药，过去驰名全省，可和安庆余良卿膏药媲美。

陈氏祖籍江西吉安府万安县，其第一代祖宗陈四一，元末追随朱元璋，为农民起义军军医，后来朱元璋建都南京，被任命主管太医院，以后告老辞官，定居安徽巢县，时人尊称四一公，住巢城十字街。后人曾于原宅屋墙根砌一石碑，志陈氏起源及迁徙经过。陈氏族祠曾在巢城中后街，三进，有屋 20 间，解放前为陈氏 25 代孙陈孟侯居之。

陈四一乐于给人治病，不取报酬，医术高明，尤精通膏药制作。其膏药疗效显著，专事施送，直到第 5 代方转为营业。其后，子孙分居，一支迁合肥、梁园，一支迁柘皋镇，第 6 代又有一支迁芜湖，皆以制作膏药营生。新中国成立后，陈氏后代多有参加革命工作者，故其膏药业逐渐中止，迄至 1980 年代唯有柘皋镇陈氏 26 代孙陈荣庭及古河陈永寿之父重整祖业，精制陈四一膏药，为四乡人民治病。

陈四一膏药可分三大类：一类用于跌打损伤，一类用于红白肿毒，一类用于风寒、筋骨疼痛。膏药分纸面、布面两种，先涂以膏，而后视病配料药，对症治疗，并不是配现成的膏药用于各种外科。陈氏各代，凡经营膏药者均深谙中医医术及中药性能。主要药物为苍耳子虫（土名歪死缠，白露时采，用麻油泡）及桃丹、凤仙花（其子为急性子）、桐油等。陈氏居巢城的 25 代孙陈贤志，于抗战胜利后，将一份 100 多种药物的秘方单交其侄抄存，可惜以后失落。

使用陈四一膏药，必先消炎解毒，再视病症配药贴之，使自动出头，而后再拔毒收功。对于农夫农妇们最感痛楚的蛇头疔、夹泥眼（夹沟炎）等症，药到病除。又如中西医均感头痛的痈疽，使用陈四一膏药，加些微麝香贴上，很快就可消肿、止痛，具有奇效。

陈四一膏药在陈氏宗谱中有文字记载，巢县县志上亦有记述。其膏药在如今乡民中仍有一定声誉。现单就特效及影响，略述数事：陈四一 25 代孙陈拱良，医术高超，凡求医者，均能速愈，尤可贵者，每遇穷苦求医人，则赠医赠药。1934 年，柘皋四乡民众，集资送两道金字大匾，其文一为“医冠中西”，一为“术能活人”。

1982 年秋，柘皋北乡钱李村一妇女，已有身孕四五个月，被丈夫打伤左侧软肋，疼痛难忍，下身流血不止，脸色蜡黄，在医院花了 200 多元未治好。她的母亲带她到柘皋找到陈四一 26 代孙陈荣庭，按脉、配方、制膏药，敷贴两次，前后 5 天即痊愈。以后还顺利地生下了孩子。

乙加 天齐庵於家小庙一农妇患十指疯——十指起泡溃烂，疼痛难忍。经西医治疗一段时

间，效果不好。后找到陈荣庭，一次治愈。

肥东县王铁公社会计王金铸、大队书记王俊华，分别于1982年秋、冬写信给陈荣庭，介绍一名筋骨疼痛患者，一名坐骨神经患者前往求诊，临床症状均很快消失。

陈四一膏药历来闻名遐迩，声誉卓著。过去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为其膏药罩上一层神秘色彩：陈四一告老退朝定居巢县后，有一乞丐，每天至其家乞讨，陈四一及家人每次均施舍，从来不厌烦。久而久之，乞丐深受感动，一日丢下一只破碗，对陈四一说，用这碗熬膏药，有神效，可普济众黎民。

陈荣庭之长子，年40有余，幼年随父学中医中药。他立志在退休后继承祖业，使陈四一膏药永葆活力。

戴氏正骨法的历史渊源及其嫡传弟子

丁洪涛

含山县东关镇自古以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涌现出许多名人雅士。三国鼎立时期，这里是重要的古战场。太平天国运动，这里曾经留下了农民起义军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刀光剑影。在历史的记忆中，享誉江淮的戴氏正骨法，以其传统的疗法、独特的功效，兀立其中，为千年古镇增光添彩。

戴氏正骨法的历史渊源

所谓戴氏正骨法，《含山县志》作了如下描述：“戴氏骨疗法，以独特的手法，中药配方，结合运用小夹板，治疗筋骨损伤，恢复快，痛苦小；戴氏创造的雷火神针疗法，治疗筋骨损伤后遗症、腰肌劳损有奇效。新中国成立后，戴氏家族成员除祖居东关外，还分布于巢湖、无为、宣城、芜湖等地，每年接待来自江苏、江西、上海和本省骨伤患者数万人。”戴氏正骨法在民间受到老百姓的青睐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戴氏正骨法的起源，《含山县志》云：“戴氏家族骨疗史可上溯 100 余年。据传，其曾祖因搭救两名太平军军医而受其传授技艺，代代相传。”据戴氏家族传人回忆，并考证《戴氏宗谱》和县志，戴氏正骨法开山鼻祖名叫戴立杨，生于清嘉庆壬申年（1812 年）。戴氏家族系名门望族，祖居含山县东关镇向日方村（又名桃园园）。戴立杨为人豁达，乐善好施。清咸丰四年（1854 年），两名身受重伤的太平军军医流落至此已奄奄一息，戴立杨冒着风险将其收养在家中，长达两年之久。两名军医感念其救命收养之恩，又念其有行医治病的天分，便将接骨技艺传授给他。戴立杨勤学好练，经常到附近的太湖山中寻找能够治伤正骨的中草药，渐渐独创出自成一家的戴氏正骨法。后来，戴立杨将接骨技术传给其子戴中满，戴中满又传其子戴信来，戴信来生了 9 个儿子：孝深、孝纯、孝昭、孝达、孝武、孝前、孝周、孝文、孝闵。9 个儿子中就有 8 人继承父业。他们并不满足于蜗居东关一隅，也是迫于生计，散居到芜湖、无为及东北等地，将传统的戴氏正骨法带至散居地，使其生根发芽，发扬光大。现如今，戴氏家族后代，从事医务工作的有四五十人之多，取得博士、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多人。但不管他们身在何处，有何作为，戴氏家族成员都将东关作为根脉。

留守东关的戴氏传人，继续在家乡为乡邻百姓正骨疗伤，把东关接骨的名声深深扎在老百姓的心中。1956 年，东关组建联合诊所，戴氏传人戴勤萱、戴济等以其祖传技艺加入其中，戴氏正骨法由祖居的向日方村走入东关老街。之后，东关联合诊所在发展

中壮大，几易其名，先后改名为东关卫生所、卫生院和中心卫生院，直至2000年9月，组建含山县中医骨伤医院。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戴氏正骨法自始至终都是主打品牌，其深远影响泽被后世。

戴氏正骨法的嫡传弟子

戴氏正骨法历经沧桑百余年，其嫡传弟子遍及大江南北，其中较有影响的除了开山鼻祖戴立杨外，还有第4代传人戴孝纯、第5代传人戴勤瑶、戴勤萱和第6代传人戴岚等。关于戴孝纯，《含山县志》记载如下：戴孝纯（1893—1959年）字静庵，因其排行老二，又称戴二先生，东关镇人，生于骨科医疗世家，是戴氏家族中医术最为精湛者。1955年7月，他在芜湖中医进修学校从事骨伤科研究，后在省立医院中医骨伤科门诊部工作，他结合多年临床实践，编写伤骨科讲义一册，公之于世。他从医40余年，治愈患者数万人。在县志中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在戴氏传人中仅此一例。

此后，从其发展来看，继承戴氏正骨医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当数第五代传人戴勤瑶。戴勤瑶是芜湖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其学术造诣精深，在全国范围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担任全国中医骨伤科学术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骨伤、推拿两个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1998年被安徽省政府授予“健康卫士”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关于其临床诊疗特点和独特的学术观点，其学生陈先进给予详细的总结，所撰写的《戴勤瑶老师正骨经验小结》一文，收集在省卫生厅中医管理局2005年4月编印的《安徽省第一周期中医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跟师学习论文集》中。其临床诊疗特别重视摸诊（属触诊范围），并独创出8字推法和盘运法，擅长发挥小夹板的特殊功效，辅之以接骨草、土鳖虫、伸筋草、血竭、山涧石蟹等祖传药物和千金独活寄生汤、桃红四物汤、戴氏活血散、戴氏腾疗方、蟹龙接骨丸等方剂。他提倡采用逐步复位法，即通过作用力使骨折逐步得到复位，在临床运用中，方法简单，复位容易，获得满意的复位效果。

与之不分伯仲的还有戴勤萱。戴勤萱固守东关大本营，以其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受到广大患者的尊崇，先后当选为含山县第一、二届政协副主席。其对戴氏正骨法的突出贡献，就是1956年加入东关联合诊所，使之走向向日方村，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他还打破祖传疗法传男不传女的清规戒律，将其女戴岚作为徒弟，并着意加以培养，使之尽快成长成材，挑起振兴东关骨伤医术的大梁。

戴岚是戴氏正骨法的第6代传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嫡传女弟子之一。她1964年从父学医，1992年被评定为主治医师，1993年担任东关中心卫生院院长。她医术精湛，将传统疗法和现代科学医疗技术融会贯通，使东关的伤骨科治疗技术独树一帜而闻名长江中下游地区。她在任10多年，投入数百万元进行技术改造，扩大医院的规模，改善医疗环境，并于2000年9月，成功地将中心卫生院创建为含山县中医骨伤医院。戴岚因其出色的成绩，被评为含山县第三届精神文明“十佳人物”。

妇科妙手岷山杨

杨乐天 王德培

闻名全省的岷山杨妇科，传说自宋末开始，至今已传 24 代，可算得源远流长了。

据巢县志、杨氏族谱记载，岷山杨起时为宋末进士，任过福州知府，传到五世孙曰广、曰义，跟随明太祖统一中国，广以功封宏农郡侯，义封昭勇将军。曰义三子隐真，不慕荣华，不愿沿袭侯爵，随其父告老回到家乡巢县岷山，为贫苦人民施诊施药，跟随名医学习妇科，医术精湛。由此岷山杨氏的子孙学医的多起来，到了第 13 代杨名远，妇科的医术达到很深的造诣。杨名远把医道传给儿子英山。杨门第 14 代孙杨淑桢，幼年随祖父游南岳衡山，巧遇一名高僧，亲传给他妇科的内外名方，他融合了杨宗祖传医术创造出“七方”、“八法”、“三大丸药”^①为主的妇科治疗方法，丰富与发展了岷山杨妇科医学，从而使岷山杨妇科发展到新的高峰。岷山杨妇科的名气越来越大，代代都出名医，在岷山周围方圆百里，为黎民百姓救死扶伤、济世活人，留下不少佳话。岷山杨妇科治病如神的故事也越传越广。

清光绪年间，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其夫人产后得病，出汗不止，在南京请众多名医诊治无效。李听说安徽巢县的岷山杨妇科驰名省内外，遂派专使到巢县请医生。巢县知县迎请李鸿章使者同到岷山杨。当时大杨村有杨柳溪兄弟三人，都精通妇科，群众称其三兄弟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杨柳溪排行老三，称杨三先生，医道尤为精湛。李鸿章派的官员到达大杨村时，大先生、二先生不敢出诊，公推三先生前往。杨柳溪不便推托，随船迅速赶到南京。至时给李夫人切脉诊治，根据她产后十余日神疲乏力、气短、汗出不止、动则更甚、脉虚而无力、舌少苔，诊断为气虚卫阳不固之症。处方用十全大补汤，加麻黄根三钱，以大补气血而固营卫，兼止其汗。旧社会同行是一家，也是冤家，南京大夫们听到巡抚大人从巢县农村请来一位乡医给夫人治病，认为是丢了他们的脸，不仅妒忌，而且想方设法找岔子，处处给杨三先生出难题，有意挑剔杨柳溪的处方。他们看到处方用的是十全大补汤加一味麻黄根，就觉得大有文章可作。南京医生认

① 岷山杨妇科，主要治疗胎前产后，以及不孕、崩漏、白带、月经不调等疑难杂症。其祖传妇科有“七方”、“八法”和特制的“三大丸药”。七方是：龙灵大丸药方、保胎方、顺胎方、催生方、生脉调经方、治胎咳方、治胎痢方。八法是：开血腑生血法、化血法、治胎气法、泻胎火化湿法、损伤保胎法、长胎复活法、产后消导法、产后无根虚气法。三大丸药是：调经丸（专治月经不调，前后愆期，赤白带下，久不生育等症）、龙灵（涎）丸（专治头痛发热感冒一切时感杂症，胎前宜用）、产后大红丸（产后腹痛、腰痛、血淤、产后风等一切产后病，用之其效颇佳）。

为：麻黄性味辛、微苦、温性，为发汗之品，夫人病后已汗出不止，再加上麻黄发汗，这不是火上加油吗？他们拣到红枣当火吹，如此这般地向李鸿章禀报：杨柳溪处方违反医理。李鸿章听后，也觉得南京的一些大夫们讲的似乎有些道理，一面叫停服此药，一面直截了当询问了杨柳溪。杨不慌不忙说出用药的医学根据：“麻黄是发汗的，但根节是止汗的。我用的是麻黄根，不是麻黄。这味药的效用在《本草纲目》第十五卷之草之四隰草类上，其五十三种中麻黄类载曰：麻黄茎发汗，而根节则止汗，其效如神……请李大人查证。”李鸿章听后半信半疑，令侍卫取《本草纲目》查看，果如其言。南京一些大夫闻之，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李鸿章则去掉疑虑，令夫人服杨柳溪开的药，连服三剂，夫人痊愈。

此时非常巧合，李夫人病愈不久，生下的婴儿忽然腹泻不止。婴儿过小不好服药，李鸿章问杨柳溪可有良方医治，杨说：“容易，有方可治，用肉果煨后研末，再用开水调和，涂在他母亲的乳头上，由婴儿吃乳时吸吮下去。”采用了这个方法，两天后婴儿的腹泻果然中止。李鸿章对杨柳溪高超的医术非常敬佩，便想将杨柳溪留在身边做医官。可是，杨三先生志要在农村行医救人，就婉言谢绝了。李鸿章不好再勉强。为了表达对杨三先生的感谢，除了赠送金银外，并亲笔给杨写了一副对联，上面写道“柳溪尊兄嘱：圣言辄与世情合，天事亦须人力为。少泉李鸿章（印）”。

从此，杨三先生和岷山杨妇科的声誉大振。

杨氏 22 代孙杨植之曾专程赴北平为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看好了妇科病。

岷山杨妇科，不仅在巢城、柘皋、烔炀、夏阁、秀芙等处挂牌行医，而且发展至合肥、芜湖、淮北等城市，芜湖至今还有岷山杨巷。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不断有人专程来岷山看妇科病。杨新吾在合肥行医四五十年，享有盛誉。

据粗略统计，现在岷山杨的后代，在全省各地行医的还有 20 多人，有 1 人还在省中医学院任教。县内已故岷山杨名医杨木斋曾著有《岷山杨妇科》一书，传之于世。

解放前无为县的医药卫生概况

武 卫

解放前，无为县医药卫生以中医中药为主。

清代，有专业中医或亦药亦医、亦儒亦医、亦农亦医的。无城镇陈厚植由举人而业医，人称中医泰斗。翟礼门、崔子云、周竹荪、沈叔东等颇有名气。襄安镇沙维斌、张鹤年、范鸿卿，严桥镇张觉生等亦被人称颂。

民国期间，无城镇王伯轩、曹宪辅、吴翠清，土桥镇陆子平，开城镇范笑天，严桥镇夏子臣等，医术颇为精湛。还有刘天士行医，为穷人治病，施舍药物，不取分文，更被人称誉。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无城有马天来、长生和两家中药店，开城镇有吴恒泰中药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全县有39家中药店。

民国十年，西医萧铁梅由外地到无城镇西门挂牌行医兼售西药，开创了县内的西医西药业。民国十八年春，刘质文（江苏人，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工作过）到无城镇开办同仁医院。他能为病人施行腹部手术，蜚声无为医坛。同年9月，倪豪芳（女，湖北人，毕业于上海伯特利妇产专科学校）同周兆玫（女，无为人）结伴到无城镇开办博爱保产医院，专治妇科病，出售西药，能注射针剂，处理难产。民国二十三年，全县共有西医院（诊所）3所，医生5人（3男2女）。不久，无城普益药房、无为药房开业，有一些盘尼西林（青霉素）之类出售，但购买一支盘尼西林需要一两石米。

缺医少药，特别是县境边远地区更甚，所以疫病流行猖獗。清同治八年（1869年），民权乡百家坞、小圩、东边董、毛竹园、段腰、马家坞、田铺7个自然村居民患血吸虫病，求诊无医。民国十一年到十九年，黄姑乡下泊山脚下，傅、应两姓两个村庄，共15户70余人染此病，无1人幸存。土桥灰河街是住有千余人的集镇，受此病厄，靡有孑遗。

民国二十三年，全县因患霍乱、天花、流脑、白喉、赤痢等传染病而亡的共有5011人。

民国二十五年，严桥张家嘴一带流行霍乱，病者300余人，10天内死86人。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七师卫生部在严家桥陈家祠堂举办抗日战地护理训练班，培训了一大批护理员，同时设立两所医疗诊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县内最早办的卫生机构。民国三十七年底，全县有中西医172人，公办的卫生院1所，私人开设的中西医诊所、药店（铺）112家。